

在跨界中尋求知識的可能性與定位

蔡友月

我的博士論文共有九章，這篇研究論文改寫自其中一章。也就是說，這篇論文所呈現達悟人普遍經歷的結構性困境，僅是整個故事的一小部分。我的博士論文試圖從社會變遷的歷史視野來回答：「精神病是什麼？」理論的對話主要環繞在此核心問題。博士論文的具體分析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探索達悟人高比率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包括遷移、家屋改建、家庭功能解組、失業、酗酒、自我認同混亂等面向，藉此反省台灣九〇年代之後從基因角度研究原住民健康的盲點。第二部分探討現今交錯影響達悟人精神失序的三個典範，亦即達悟傳統、基督宗教與現代精神醫療，並且分析不同世代達悟人所面對不同階段的社會變遷與世界觀的轉換，如何形塑其相異的疾病經驗。不過在這篇研究論文，我把原先所關注「精神病是什麼？」這樣一個較高層次的問題，重新聚焦在「遷移、挫折與精神失序」彼此的關係上。在尋找理論對話對象的過程中，我發覺一個本地社會的重要現象，往往未必是以歐美為主的國際學術社群理論關注的焦點。對我而言，這樣的緊張是珍貴的養分，形塑了我發問的起點、回答問題的方式、以及研究的某種基調。

從問題意識的浮現到決定進入田野，離開自己所熟悉的環境，到離島的原住民部落從事一個對我而言是高難度的民族誌研究，融合了我從護理訓練、醫院臨床工作、媒體編輯到學習社會學一路以來的探索與追尋。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癌末病人，探討現代人垂死歷程「醫療化」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指出醫院科層化組織制度與科技理性運作方式，在面對現代人的死亡時都有一定的限制。這樣的結論刺激我進一步思考：我們能不能從歷史、社會文化面找到可以幫助我們面對生、老、病、死的其他力量？2000年擔任報社醫療版的編輯時，我注意到達悟人高比率精神失序的特殊現象，同時決定以解答心中的問號做為重回學院努力的方向。在找尋答案的這些年，我開始經歷幾個不同面向的跨界所帶來的衝撞：一、地理的：蘭嶼、台灣、美國；二、族群的：原住民、漢人、美國人；三、社會型態的：傳統、現代、高度現代性；四、現代社會規範的：正常人、不正常人；五、知識的：醫學、社會學。身處這些跨界的拉扯中，我不斷思考自身知識的可能性與定位，並由此萌生出路。

我到蘭嶼的第一個夜晚，部落的朋友把我安置在牧師家。那幾天，牧師的兒子衫明正從高中放寒假返鄉，他熱心地帶我爬屋頂看海，高興地彈著吉他，和我分享在高中演唱會所唱的歌曲。我怎麼也沒有料到，兩年後再度拜訪，牧師告訴我：「我的孩子也變成你的研究個案了，他

現在已經從大學休學回家了。妳要不要和他聊一聊？」我不知道那些原本只被我當成研究假設的命題，一旦活生生在我的眼前被驗證時，我的社會學知識追求本身的意義何在，而社會學知識要如何幫我釐清這些荒誕背後所彰顯的意義。

我也永遠忘不了陳安安第四次出院那天，在他家僅有四、五坪大的簡陋鐵皮屋中的一段景象。僅有國中畢業程度、沒有任何電腦相關技能、家人明白表示根本沒有碰過電腦的他，卻一臉認真地告訴我：「我未來的工作目標，是要到台灣做網際網路。」在這個遠離台灣社會、與世界的核心相隔渺遠的小島上，許多人、許多畫面就像安安認真的表情一樣，慢慢地烙印在我腦海，久久無法離去。

然後帶著這些印記，我飛向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2004-2005年我獲得公費獎學金，到美國參與一個「跨文化精神醫學」的研究計畫，接受為期一年的上課與訓練。臨走前我對著一位達悟的好朋友說：「回來後或許會比較能夠體驗你們遷移台灣的辛苦。」後來，我才明白這是自己的大話。支撐我到美國深造的機會結構，遠超出大多數遷移台灣工作或求學的達悟孩子所擁有的。我既接受美國生活的全新刺激，也開始下意識的比較蘭嶼與它們的不同。這樣的經驗有點類似長期在海地進行田野研究，同時兼具哈佛教學醫院醫師與人類學家的 Paul Farmer 的體驗。他說往返於肯吉（海地）和波士頓的旅途，總令他心情起伏不定。一邊是嚴重營養不良，另一邊卻是衣著光鮮者大談減肥之道。擺盪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促使我去問更深刻的信仰問題。Farmer 說得好：在一個表面上無神論、崇拜金錢與權力、講求個人效率和升遷的世界，上帝的存在仍然有跡可尋，可以從窮人所受的苦難去尋找。在這段學習歷程中，我幸運地經歷到神的帶領，並從中領悟到：不管是現代醫學或社會學，或者其他的知識與實作，在舒緩解決人類的受苦與創傷上，都有一定的局限，因此應有謙虛與自制，才不會導致特定知識或世界觀衍生的權力濫用，轉而製造人們的另一種受苦與創傷而不自知。

在論文寫完之際，一些田野中受訪者的年輕生命有如流星，以極快的速度隕落。原住民平均餘命遠低於漢人、意外事故頻繁、死亡率集中在青壯人口等健康報告中的統計，活生生的不斷展現在我所見所聞的那些受訪者身上。在田野中，我逐漸發現，探究目前在蘭嶼島上任何一位達悟人的"zipos"親族網絡，一定可以找到自殺、酗酒、發瘋、意外死亡的成員，無人能夠倖免。經過長期的社會學角度的觀察與探討，我相信達悟人青壯世代高比率的精神失序，那些田野中不斷遇見的身心創傷，不是偶遇的、隨機的，而是一個少數族群集體性的宿命，是與族群身分、地理位置、文化傳統等有關的社會不平等結構位置帶來的多重受苦。我期望這些研究發現，有助於尋找對症下藥的處方。